

王立业 主编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集思文丛「第一辑」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 主办

洛特曼

学术思想研究

洛特曼学术思想解读

符号学研究

洛特曼比较研究

俄罗斯文化·中俄文化对话

文学

翻译

语言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

主办

集思文丛

「第一辑」

曼 特 洛

学术思想研究

王立业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王立业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5

ISBN 7-207-06952-9

I. 洛... II. 王... III. ①洛特曼—文艺学—学术思想—研究—文集 ②洛特曼—符号学—学术思想—研究—文集 IV. ①I0-53 ②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1739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于克广

徽标绘图:韦尔乔

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

Luoteman Xueshu Sixiang Yanjiu

王立业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625

字 数 540 000

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952-9/B·256

定价:46.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迎接俄语学科的春天

——写在《集思文丛》(第一辑)前的几句话

随着 2006 年钟声的响起,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科踏上了第 65 个年头。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磨砺,如今我们俄语学院已步入学术盛年,并以其特有的勃勃生机和昂扬精神,朝着改革与振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只有明确了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俄语学院刚刚制订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学科发展的新目标,那就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学院建设成以本科教育为主体和基础、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等多学科并举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单位。

根据这项规划,学院将在未来的五年里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拓宽学科领域,由单纯的“俄语语言文学”学科逐步发展成为范围更加宽泛的“俄罗斯学”学科方向;二是提高办学层次,由目前的本科教学为核心逐步转变为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并重,使硕博士生与本科生的比例由目前的 1:3.5 调整到“十一五”末期的 1:2。

实现这个目标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全体师生的信心更是坚定的。现在,全院的学术气氛空前浓厚,科研积极性十分高涨,仅最近几个月就获批各级科研项目 8 项,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还会有更多的师生加入到科研队伍中来。

俄语学院的“十一五”规划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肯定,学院的发展更得益于国内学界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现在面世的《集思文丛》就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关怀与资助。借此机会,我代表俄语学院全体师生向北京市教委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相信俄语学院的发展,会对北京市的俄语人才培养、对全国的外语教学改革和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 史铁强

2006 年 1 月 12 日



目 录

迎接俄语学科的春天

——写在《集思文丛》(第一辑)前的几句话 / 史铁强

洛特曼学术思想解读

- [001] 尤·米·洛特曼的学术生涯 / 黄 玫
- [008] 塔尔图学派的形成与特点 / [爱沙尼亚]米哈伊尔·洛特曼
- [015] 论洛特曼的日常文化观 / 李英男
- [024] 诗本·诗筑·诗析
——洛特曼的诗本结构分析法及其验证 / 刘永红
- [042] 意义构成的编码与文化政治
——Ю. М. 洛特曼意义理论初探 / 彭 甄
- [037] 洛特曼符号学的人文思想初探 / 赵晓彬
- [045] 二元对立的重新思考
——从洛特曼的意义创新机制说起 / 罗 苹
- [049] 洛特曼论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流派 / 李俊升
- [062] 简论洛特曼的现实主义文学史观 / 李新梅

符号学研究

- [071] 符号论与文化比较 / 白春仁
- [086] 关于 20 世纪中期前的苏联符号学研究 / 王铭玉 陈 勇
- [096] 走向体系研究的艺术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
——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理论探索 / 张 杰
- [103] 文本符号使用者的语义学阐释
——兼论洛特曼的文本符号学理论 / 郝 斌
- [114]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文本 / 康 澄
- [126] 洛特曼的符号学文化观 / 李 肃
- [133] 解读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 / 贾淑芬

[141] 转喻机制的符号学阐释

——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二元对立思想谈起 / 蔡 晖

[154] 洛特曼符号域边界理论研究 / 管玉红

[161] 两种思维符号与文学文本 / 高 艺

[167] 历史文本意义的文化符号学分析 / 白 茜

[172] 对符号域内涵的一种解读 / 郑文东

[176] 从文化符号学看电影文本的解读 / 张冬梅

[188]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文化机制的再思考

——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视角 / 李兰宜

洛特曼比较研究

[194] 巴赫金与洛特曼论对话 / 凌建侯

[202] 知识分子功能的转换浅谈

——齐格蒙·鲍曼与洛特曼对话的启迪 / 李小桃

俄罗斯文化·中俄文化对话

[206] 中俄比较文化学和文化符号学目前发展的基本方向 / 奥·阿·涅斯捷

罗娃

[213] 俄国结构诗学的中国式解读 / 张 冰

[219] 管窥中俄文化比较的可能途径 / 郭世强

[225] 中俄文化对话中礼物符号的象征意义 / 孙翠英、奥·涅斯捷罗娃

[234] 浅议彼得堡的象征意义 / 何 芳

[242] 解读俄罗斯历史上的冒名为王现象 / 敬菁华

[248] 试析跨文化交际中信息接受的非等值性

——文化符号学视角的研究 / 陈 戈

文 学

[257] 关于文学文本与文学批评话语的思考

——谈应如何确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 张建华

[262] 作者·文本·读者

——勃留索夫论屠格涅夫 / 王立业

[273] 重读特里丰诺夫 / 潘月琴



- [287] 文学与时代
——米·布尔加科夫创作溯源 / 叶丽娜
- [292] 苹果在哪儿
——布宁的《安东诺夫卡苹果》符号学解读 / 王 业
- [297]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解读 / 贾 茜
- [304] 烈火金“钢”
——作为文化文本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柏 英

翻 译

- [309] 施维采尔的等值理论评析 / 汪嘉斐
- [321] 符号翻译理论与文化对比研究 / 尹 城
- [332] “汉-俄”翻译转换的文字符号层次等值 / 哈斯耶提
- [340] 政论文体与文艺作品的翻译
——实例分析 / 王凤英
- [351] 试论俄汉语口语中经济性与冗余性的对立统一 / 王晓娟
- [360] 华建俄汉机器翻译系统及其多层次的软件开发 / 李向东 周清波
张心红
- [368] 翻译中的交际互动模式 / 高雅古丽

语 言

- [375] 关于语篇信息性的两种解读 / 史铁强
- [385] 篇章语义的多层级体系分析 / 周小成
- [397] 篇章研究纵横谈 / 王凤英
- [412] 试论掌握俄语语言机制的重要性 / 郭淑芬
- [424] 2004 年全国俄语专业四级水平测试结果的数据分析 / 刘素梅
- [432] 编后记 / 王立业

尤·米·洛特曼的学术生涯

北京外国语大学 黄 玫

尤里·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1922—1993)是俄国后苏联时期最著名的、也是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大学者之一,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他的名字是不需要介绍的。在俄罗斯,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洛特曼,家里的书架上都会有他这方面或那方面的著作。或许这种说法有夸大其辞之嫌,但的确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洛特曼的学术成就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我们从他一生所担的多重角色也可对此窥见一斑:文艺学家、符号学家、文化学家、塔尔图大学教授,语文学博士,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同时还是很多国外学术团体的成员和国际性学术刊物的编委。然而,在这一系列头衔中,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他是塔尔图符号学派和俄国结构主义理论重要的奠基者和领袖人物。

一、洛特曼生平简述

洛特曼于1922年11月28日出生于彼得堡(当时叫彼得格勒)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是一位在彼得格勒和更名后的列宁格勒颇负盛名的律师,20年代末,由于政治环境所限,他感到自己无法使被辩护人胜诉,便放弃了有相当收入的私人律师职位,做了列宁格勒出版社的法律顾问。母亲是一位医生。还有三个姐姐:大姐是音乐家,二姐也是文艺学家,三姐是医生。洛特曼的家庭在当时过着十分普通的日子,甚至可以说很拮据,但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在父亲的熏陶下,洛特曼经常去参观“爱尔米达日”和“俄国博物馆”,由此对俄罗斯文化和世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洛特曼本人没有写过回忆录,但曾在1989年接受英国BBC电台的采访,录制了对童年、青年时代回忆的节目(因故并未在电台播出),对自己的成长道路作了客观的描述,后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又口述了自己包括塔尔图时期的生活和创作经历。

学校生活给洛特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读的学校是附属于圣彼得教堂的一所德国学校,先是8年制,后又变成9年制,而到洛特曼毕业时已是一所10



年制学校。这是一所当时很有名气的学校,在1920年30年代,全部都是用德语授课。但在当时,社会环境动荡不安,洛特曼就读的班里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同学的家长被枪毙。在这样的情况下,1939年,洛特曼中学毕业。作为优秀毕业生,他被免试保送到列宁格勒大学(现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大学生活开始刚刚一年零两个月之后,由于卫国战争爆发,1940年秋,洛特曼不得不中断学业,应征入伍,在第427炮兵团做通信兵,并且随苏联红军一直攻到柏林。1946年,他复员重返校园,曾参与莫尔多夫琴科领导的讲座小组的活动,做过语文系学生学术团体的负责人。194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关于M. A. 德米特里耶夫-马蒙诺夫的〈对俄国骑士们的简明训言〉》。1950年,洛特曼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应该说,当时的洛特曼可以算是战后年代里最优秀、最有前途的青年学者之一。然而,50年代初,正是苏联国内反“世界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洛特曼虽有战功勋章和优秀毕业生的证书,但身为犹太人,他既不能报考研究生,也无法在他的故乡列宁格勒找到工作。尽管欣赏他的教授们,特别是洛特曼的论文指导老师,时任俄罗斯文学教研室主任的莫尔多夫琴科教授,为此多方奔走,洛特曼还是只拿到了一纸所谓的“自由毕业证”,即不予强行分配工作,允许自己找工作的毕业证。最后,经一位被分配到塔尔图师范学院的女同学介绍,他辗转来到爱沙尼亚(1991年以前,爱沙尼亚属于苏联),先在师范学院谋得高级讲师的职位,后塔尔图大学因扩招而空出编制,他受到邀请至那里任教,直至终生。1951年,洛特曼与大学时代便已结识的扎拉·格里高里耶夫娜·明茨结婚。妻子也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文艺学家,可称是洛特曼学术道路上的旅伴。

1993年10月28日,洛特曼逝于塔尔图,享年71岁。

二、学术道路的开始

从洛特曼的生平中可以看到,洛特曼对文学和文化的兴趣应该说是始于幼年家庭的熏陶,但他科研的起步阶段应当从大学时代算起。据洛特曼本人回忆,他大学生活开始的这一年多时间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30年代的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刚刚组建,但其人员组成,堪称世界文化史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当时,阿扎多夫斯基教授教民俗课,而普洛普只被允许参加课堂讨论会。在一个教研室里有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足以证明其水准了。文学教研室的主力干将有古科夫斯基、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吉皮乌斯、多里宁、马克西莫夫等数十位杰出的学者,语文系的著名教授还有申什马廖夫、谢尔巴、泽列宁、日尔蒙斯基等。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自己学科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于是,每一节课都成为一个重大事件,每一节课都是一场精彩的演讲,充满新鲜思想和活力。当时列宁格勒大学的学习氛围也异常浓厚。洛特曼回忆说,他当时先在学校上课,然



后在小卖部里飞快地随便吃点东西,之后便在公共图书馆钻研直至闭馆,回到家里后,还会继续学习至深夜,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这种学习习惯洛特曼坚持了很久,直至晚年体力渐感不支才改变。而当时学校里的那些世界级的知名学者师德高尚、诲人不倦,即便对一个一年级的新生,也可与之探讨学术问题,耐心倾听其见解。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向任何一位教授——无论是古科夫斯基还是莫尔多夫琴科请教。现在看来,当时的列宁格勒大学在文艺学方面的阵容的确十分强大,这对洛特曼后来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刚刚在塔尔图找到立足之地的洛特曼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之中。他讲授的课程包括古俄罗斯文学、18~19世纪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民俗和文学理论等。1952年,洛特曼通过副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为《与社会政治观念进行斗争的A. H. 拉季谢夫及H. M. 卡拉姆津的贵族美学》。1958年,洛特曼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戈萨罗夫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和政治斗争》。1960年,洛特曼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前十二月党时期俄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到,当时洛特曼致力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研究,以其一生在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他关注的领域主要是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中叶的俄国文学,涉及拉季谢夫、卡拉姆津、十二月党人作家、普希金、果戈理等。其时,他已经开始关注文学与生活、与文化习俗的关联,而对文学中文化背景的关注使他更能挖掘出文本的潜在内容。经过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系统深入的研究,洛特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他的结构主义诗学最终走向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乃至文化学,其根源便在他早期的这些文学研究中。

三、对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兴趣

符号学的思想方法和结构分析的具体操作方法使得洛特曼的结构主义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阐发。他曾在致B. Ф. 叶果洛夫的信中讲到方法论的问题,认为学术研究的本质不在主题,今天流行写人民性,明天又都去写时间和空间,再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都会有时过境迁而不被需要的一天。问题在于要有新的方法论,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Лотман 1997:220)。

洛特曼本人很早就开始对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发生兴趣。早在大学一年级时期,他就接触过结构主义语言学鼻祖索绪尔的著作。到60年代,他将这一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当时得到广泛研究的控制论结合起来,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并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上。最先进入他视野的,便是俄罗斯诗歌这块宝藏。1962年,洛特曼讲授诗学中应用结构方法的课程,讲义材料汇集成册,于1964年以《结构主义诗学讲义·引论·诗歌理论》为名出版。这本

书奠定了俄国结构主义诗学的理论基础。在此书基础上,1972年又出版了《诗章分析·诗歌的结构》一书,这本书在理论部分中便增加了一些具体细致的诗歌篇章分析,后面又专门分析了12篇俄罗斯经典诗歌,将俄国结构主义诗学对诗章进行分析的独特方法充分呈现出来。

洛特曼的诗学研究方法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但却曲高和寡。有相当多的批评者认为,在洛特曼的结构方法中过分强调文本内的因素,而忽视了对文本外因素(如历史)的研究。事实上洛特曼的符号学研究中并没有排斥历史,他只是在符号学研究的开始阶段主要从事“共时的”分析,之后很快就重新转向“历时”、历史。在1974年1月写给姐姐莉季雅的一封信中,洛特曼就姐姐一篇分析费特诗作的论文发表看法时,这样写道:“你对文本的中间层次,即词汇和布局的层次做了非常好的分析,这是应该的,因为这正是诗篇中最重要的层次。但在低一些的层次中也不是无事可作,如语音的层次、韵律的层次〈……〉还有另一个更高级的层次:文本不仅有自己的思想,同时还有自己的神话来源。”(Лотман 1997:58)这再一次印证了洛特曼对诗章结构分析的原则和看法。也可以证明,在洛特曼的结构中,不仅包含思想内容层面,而且包含诗章外对诗章结构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在维护和阐释结构主义的纲领性辩论之作《文艺学引论应该成为一门科学》中,洛特曼这样写道:“当我们同一些复杂的结构打交道时(艺术正属此列),对这些多层面的复杂结构进行共时的描述十分困难。了解此前的状态是成功进行模式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结构主义并非历史主义的敌人,不仅如此,必须将单独的艺术结构(作品)看作是更为复杂的统一体的成分。这些更为复杂的统一体就是‘文化’、‘历史’。”(《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67, №1: 94)

众所周知,此前苏联文艺学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和思想内容方面,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对作品本身的分析通常是以《普希金的创作技巧》之类的标题出现的对创作手法和技巧的研究,而洛特曼则在此基础上提出结构的观念,将诗歌作品的所有因素(从主题思想到音位的区别性特征)都纳入统一的结构之中。洛特曼还倡导精确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应用统计学、信息理论、数学、逻辑等方法,并且因此在解读文本中有一些细致的新发现。这一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在当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即使是在4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很多思想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而当时结构主义方法多遭诟病,不仅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有来自学术界的。现代学术研究中,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野太过清晰,导致研究者没有全面的知识储备。甚至同为人文学科,语言学家欠缺文学和文艺学的素养,文艺学家又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知识不甚了解,而基于文本实际的结构分析恰要借助很多数学方法,这种跨学科的结合为文艺学开辟了前景广阔的新路,也因此在当时曲高和寡。一些学者正是由于自身的无知而指责结构主义。对此,洛特曼举了他的一个匈牙利籍学生讲的一件事为例来说明:一



次,这位匈牙利人与妻子用本族语言交谈时,偶有一位第三者在场。片刻后,此人突然恶狠狠地说:“你们难道不会讲人话吗?”洛特曼指出,有些人对将语言学 and 符号学的方法用于文学研究的愠怒,就如同这位不懂匈牙利语的在场者,恰是由于不懂行。

洛特曼结构主义诗学产生和发展的环境,是在六、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停滞时期”,当时的文学深受政治的影响,热衷于塑造“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形象,文学界和批评界盛行的是粉饰太平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些具有鲜明的人文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为时尚所左右,坚持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并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使整个人文科学深受其影响,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今天看来,洛特曼结构主义诗学中最具积极意义、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并不在于它的成就,甚至不在于卓有成效的方法,而在于它的开放性思想充满启蒙的激情。在其身后,结构分析的方法几乎被用来分析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从罗马历史到人的大脑半球,从音乐和谐的规律到肖像研究等等不一而足,直到今天仍然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应用领域。

四、文化学研究

由文学到文化学的过渡对洛特曼而言并不是十分清晰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将洛特曼最有成就的这两大研究领域沟连在一起的,仍然是符号学的思想和结构分析的方法。在结构主义诗学方面的代表作《文学篇章的结构》一书中,洛特曼提出“派生的模式系统”这一概念,认为自然语系统是原生的、第一性的模式系统,而诗语相对于自然语是一种“上置”的行为。当时洛特曼即认为,“派生的模式系统”包括的范围极广,不仅包括建立在自然语基础之上的文学篇章,还包括按其模式建构的其他符号体系:音乐、宗教仪式等几乎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在此列,而把语言的概念从语言学研究的自然语扩大到文学、进而到文化所使用的一切符号,正是作为符号学者的洛特曼在文化学研究方面坚实的第一步。“于是文学有了自己的语言,音乐有了自己语言,建筑有了自己的语言,哲学有了自己的语言,电影有了自己的语言,民俗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不再是一种隐喻,而是实实在在的各类符号,都是物质性的载体,负荷着文化的信息。再进一步,文本/текст/的概念也从文字作品扩大到一切文化事物。这样一来,一部电影、一幅绘画、一首歌曲、一场舞剧、一个故宫、一个春节、一场祭祀、一个事件,都因为传递特定的文化信息而成为文化文本。”(白春仁《符号论与文化比较》)在洛特曼用俄文发表的800多篇论文和著作中,文化学的题目占了相当的比重,例如:《文学和神话》、《电影符号与电影美学问题》、《文化符号学和篇章的概念》、《关于文化系统的二种交际模式》、《文化类



型学论文集》等等。其文化学方面的代表作可认为是《在思想世界的内部》一书（该书本是为一家英国出版社所写，俄文版于1996年在俄国面世）。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符号域、文化边缘与中心的交替等主要文化学思想。洛特曼晚年的另一部专著《文化与爆发》（1992）也成为文化学方面的经典之作。

80年代末，洛特曼就已经预见到，他在文化学方面的研究将会超乎意料。1989年，他因病在慕尼黑住院时，口述并请妻子记录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他将要写的文章认为，可能存在与历史上已有道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主题也可能是梦呓，但若能有所成，将会得出十分重要的结论。”（Лотман 1997:87）事实证明，洛特曼的文化理论的确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他以符号观和结构观分析文化，不仅开创新意，“而且层层深入，精彩叠加，演绎出一个理论体系，既超越了符号学前辈，也截然不同于当代的其他学派”（白春仁《符号论与文化比较》）。

五、学术组织活动

洛特曼独具特色的文艺和文化符号学研究在当时也并不是孤军奋战。洛特曼本人也积极投身到学术研究的组织活动中。60年代，洛特曼致力于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诗学之时，他结识了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莫斯科语言学家和文艺学家，这是他创作生涯中有着重要意义的里程碑。1962年，他们共同组织了对符号系统进行结构研究的研讨会，1964年，在爱沙尼亚的基亚埃里库举办了首届“符号系统夏季研修班”，从而奠定了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基础。在这一学派中，聚集了一批当时苏联国内最优秀的人文科学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涉及符号学、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从广义而言，他们更多地被认为是开俄国符号学研究的先河，因而又被称为塔尔图-莫斯科结构主义符号学派。莫斯科和塔尔图学派在各自的发展中是密切相联的，两派成员接触频繁，学术主张也大体相同。莫斯科方面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B. H. 托波罗夫、B. A. 乌斯宾斯基、A. M. 彼亚基戈爾斯基等，而塔尔图方面则是以本文所论的主角 Ю. М. 洛特曼为核心，还包括 З. Г. 明茨、B. M. 加斯帕罗夫、П. А. 鲁德尼奥夫等，但其公认的核心和领袖人物是 Ю. М. 洛特曼。

在洛特曼和同道者们的努力下，1966、1968和1970年又分别举办了三期“符号系统夏季研修班”。雅各布森曾克服极大困难，从美国赶来参加过一期研修班的活动。

除研修班外，于塔尔图出版、创办于1964年的《符号系统研究论文集》成了联结莫斯科和塔尔图学者的纽带和发布新思想的讲台。洛特曼的很多重要文章都首先发表于此。

洛特曼及其同仁对每一期的“夏季研修班”和《符号系统研究论文集》都倾注了全部心血,当时的大环境始终令他们有前途未卜之感,他们珍惜每一次机会,把每一个会、每一期杂志都当成最后一次来做。情况也的确如此。70年代起,由于政府的干预,“符号系统夏季研修班停办,莫斯科的符号学家们遭到讯问,远在爱沙尼亚的洛特曼也受到影响,不再担任俄罗斯文学教研室主任职务,并被调到外国文学教研室。《符号系统研究论文集》的出版也越来越困难,并最终被莫斯科书检机构禁止,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洛特曼的知名度日益提高。他频繁地穿梭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讲课、做报告。他的著作开始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1992年,在洛特曼的主持下,塔尔图大学成立了符号学教研室。

参考文献

1. Егоров Б. ф.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Ю. М. Лотмана,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М., 1999.
2. Лотман Ю. М. 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Искусство, М., 1970.
3. Лотман Ю. М. О двух моделя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в системе культуры // Труды по знаковым системам 12, Тарту, 1981.
4. Лотман Ю. М. Письма. Школа, М., 1997.
5. 白春仁:《符号论与文化比较》,本次会议论文,2005年。



塔尔图学派的形成与特点

[爱沙尼亚] 塔尔图大学 米哈伊尔·洛特曼*

我很荣幸,也很高兴在这里向尊敬的同事们谈一谈塔尔图学派。这个人文学术思想的流派,从历史上和研究内容上看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个来源是莫斯科一批青年语言学家、东方学家,他们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期,开始寻求同控制论的沟通。控制论在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期在苏联是被禁止的。大约 50 年代末,出版了 Н. Венер 的几本书,还译出了 У. Р. Эшби 的《控制论概论》,从 1961 年起在苏联整个人文学科中成为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些青年学者开始探索解决人文科学问题的新方法,因为当时正统的文学理论、语言学的状况,虽不能说很糟糕,却处于僵化之中,表现在思想创新方面和组织形式方面。他们在机构之外办起了研讨会。对于学派的形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在高尔基市开了一次学术会议,由年轻的数学家、控制论学者、语言学家、东方学家共同参与。这之后出现了许多小组,他们开始发挥这些思想。这里需要提出几个人来。首先是 Вячеслав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Иванов,还有他的老友、同事 В. Н. Топоров。他们两人个性和思路截然不同,但在某方面很像结构主义者 Р. Якобсон 和 Н. С. Трубецкой 这一对朋友。Топоров 同 Якобсон 一样,思想相当深刻,不断有新的见解。Иванов 和他两人都是斯拉夫学研究所的,但来源不同。Иванов 是个多语专家,通晓许多语言,最初是研究印欧语系一些已死亡的小语种,但另一方面他从开始就致力于数理语言学。Топоров 后来许多年里研究斯拉夫学,开始却是个东方学家。他们两个总在寻求新东西、新关系、新学生。再有 Успенский 兄弟两人,Владимир 和 Борис。起初比较重要的是 Владимир,是位数学家,是俄国非常有名的数学家 А. Н. Колмагоров 的学生。Колмагоров 是 20 世纪大数学家,研究主要有两个领域,一是数理统计学,另一个更重要的是算法理论,在两个方面都有相当重大的建树。Владимир 就是搞算法理论的,也称自动理论。这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美国人 А. М. Тьюринг 就研究出了自动机器,成为后来计算机的普遍模式。Владимир Успенский 得出一个结论:数理研究与人文研究干的实际是同一件事,都试图找出规律性,把它形成为自己的算法。他的兄弟

* 本文作者系 Ю. М. 洛特曼之子,塔尔图大学教授。



Борис 是语言学家,是苏联最早去西方进修的。后来又有一些哲学家参加进来,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 Александр Моисеевич Пятигорский。他搞哲学、心理学,又是主要的东方学家,首先是研究印度文化、印度语言,还有佛教心理,不是佛教的哲学而只是佛教的心理学。他尝试把这些同欧洲传统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结合起来。

学派另一来源是塔尔图大学。就在这同时,在塔尔图我父亲正探索摆脱文学理论危机的方法。因为这些人研究的是不同学科,其中却没有搞文论的,莫斯科全是数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60年代初,父亲开过几种课,后来这可叫符号学,当时叫结构方法的诗学研究。60年代他这方面第一篇文章就是区分语言学和文艺学中的结构概念。他的结论是:把语言学方法简单地移用到文学文本上是可行的,但成效不大,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与莫斯科学者是有差异的。莫斯科学者认为:用符号学或结构主义符号学来研究文学、文化等等,就意味着把数理语言学的方法移用过来。任何现象都可用这一普遍的方法加以概括。例如苏联语言学家 Мельчук 提出了语言模式理论,主张用数理语言学来描写一切文化现象。我父亲起初认为这一普遍的方法需得以后一点一滴地创造,后来认识到原则上不可能有这种统一的方法。这一分歧引出了重要的后果。莫斯科的路径是欧洲科学传统的研究路径,从简单到复杂。而对复杂的现象,我们不可能把握全部的复杂性,因为难以实现,所以把它分为简单的部分,一点点研究,最后再恢复成整体。这是19世纪理性主义、笛卡儿的原则!我父亲走的是另一个路径,当时人们称之为系统论的方法。系统论认为,面对复杂现象,与其分解开来一部分一部分地分析,不如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从整体研究开始,再进入局部,有时更为简要却不失准确。这就不是从简单到复杂,而是从整体到局部了。父亲同样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文学文本在某些方面比非文学文本不是更复杂而是更为简单了。人们分析文学文本,一般先得研究它的语言,然后再加上文学流派的内容,加上心理的内容,再加修辞的内容,如此等等,很复杂。父亲认为如果把文学文本看成一个系统,我们只考察属于这个系统的因素,排除不属于这个系统的因素,专门来研究文本系统的结构等等,问题就简单明了多了。一切文本都构成为系统,但却没有统一的分析方法。这样,莫斯科学者倾向是从简单到复杂,塔尔图学者则是利用系统论,从复杂到简单。这一点非常重要,一直贯彻在父亲的研究中。

符号学在欧洲起始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中世纪符号论有了很大发展,但后来被人们遗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不同的研究者。可举出三个人来:Ч. С. Пирс,美国哲学家;Ф. Соссюр,瑞典语言学家;德国的 Фреге。讲到符号,有文章引述了符号(знак)的定义有30种,又有另一篇文章又举出30种。那么到底什么是符号呢?有人这样说:符号是某种东西,为了某种目的,来替代另一个某种东西,在某一范围和性质上,也可说在某种质和量上。一个定义



里有四个“某”字的未知项。实际上这并没有给出定义。依据欧洲方式定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确定事物的种属和指出类属的特征。如果定义椅子,得先归于家具一类,再说明它与别的家具(桌子等)的不同之处。因此有人说:符号没有办法定义。总之,一切认知是从符号始,以符号终,全得使用符号,而符号本身是无法定义的。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中世纪欧洲思想里的 *схоластика* (经院哲学)。这个词常带有贬义,但也可指称一种哲学倾向。从符号学观点看,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符号,只是潜能不同。有的事物首先是东西,有时可用为符号,有的事物首先是符号,有时用为东西。Пирс 着重讲什么是符号,它与其他各种关系,怎样出现符号学,Соссюр 则把语言摆在第一位,然后才是词语符号,所以符号的要害不在自己,而在它与其他符号的关系。这是两人符号观上的不同。在这一学派中,我父亲比莫斯科学者更接近 Соссюр 的精神,即更看重总体规律而不是单个的符号。

父亲不仅强调 Соссюр 所说的没有孤立的符号,而且强调任何文化现象都不只用一种语言,起码得使用两种语言,而且它们具有不同的符号性质。文化中总存在着一种符号,它与意义没有明显的联系,例如自然语就是这样的系统,同时又有另一种符号,它与事物有天然的联系。这是原则上不同的两类符号。Пирс 有十分详细的符号类型分析。符号主要有图象性的;有 *индексальный*,据事物的相邻性而来,如 *указательный палец* 食指;又有象征性符号。德国逻辑学家 Фреге 在 1892 年有一文“О смысле и значении”,说任何符号均有内在与外在两个意义,如说“奥涅金的作者”,内在义是普希金,外在义是此书作者;又如“我”字,只有外在义而无实质的内在义。不同类型的符号,这两大类符号,在任何起码的文化现象中都是共存的,它们处于对话之中,任何时候都是两个编码(文字的和形象的)相互结合。

现在我来讲一讲文本(текст)问题。这是学派的核心概念。在 60 年代初、中期就提出文本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语言体系。而 Соссюр 只讲语言体系,语言是不变的,只是言语才变化,但言语不是符号。文本自己的特点是什么?首先它有头有尾,是自己的边界,以此与非文本相区别;再有就是文本具有布局,这布局规律不是由语言体系决定的。文本还具有普遍性的语义特征,有普遍的意义结构,所以可用统一方法来研究。学派研究文本意义,采用了二元对立的方法。二元对立方法起初是 Трубецкой 提出的,他是研究语言的音位系统,塔尔图学派则用它研究文本。二元对立系统本身是没有含义的,但它能区分意义。这个系统可以说是一种工具语言,利用它能描写各种的文本,各种的体系。如任何文化中都有崇高与低俗的对立,我不细说这些对立。每一文本都是独特的,因为是由多种二元对立组合而成,是独特的组合,不同于其他文本。这很像语言中的音位系统。Трубецкой 的二元对立说,被 Якобсон 发挥采用,用 12 组对立关系来描写一些语音系统。